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2.030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符号语境论

张 碧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遵循的整体论传统,使其将关联性语境论和差异性语境论两种语境论类型作为其基本符号学实践途径。同时,为克服差异性语境论的功能性缺陷,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发展出的指称物语境论使其对符号语境论的理解和运用得到进一步延伸,从而使其符号学实践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历史社会现实为考察对象的传统立场。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关联性语境论;差异性语境论;指称物语境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6)02-0151-05

作者简介:张碧(1982—),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艺学与西方文学研究。

众所周知,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文化转向”后,逐渐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近代诸多其他哲学思潮进行过深入的批判性吸收,其中便包括对符号学的运用。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将符号学理念或方法运用至对文学及社会文化的剖析之中,使得作为社会批评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领域得到有效扩展。

由于符号学自身属性的多样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符号学的援引途径也相应呈现出多元趋势。其中,对符号语境论原理的运用,亦即从语境角度对符号意义的生成性进行把握,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实践的表现之一。

一、符号语境论的整体论意蕴

有着长达数千年历史脉络的“整体论”,是西方

自然及人文科学诸多思想传统及领域中的重要命题。这一观念的核心论点是:诸多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整体,而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在整体的背景下,通过与其他关联性组成部分的相互比照,方能获得其认知意义。仅以文艺领域而言,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即在其《诗学》中提出戏剧是对某种行为整体性的模仿过程,可谓整体论在西方文艺思想中的最早体现之一。整体论观念历经数千年传承,在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从上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莱布尼茨、帕斯卡尔、黑格尔及至现代思想界,整体论在西方思想史上始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地位。

符号语境论是现代符号学的议题之一,强调符号能指在特定整体氛围中获得其具体所指意义的属性,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则至少出现过两种不同范畴的语境论类型,一种最为常见,认为符号意义,是在

收稿日期:2015-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23);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JK0404)

与其存在联系性关系的毗邻因素或环境的压力下实现的;另一种则主要体现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特征,认为对作为语境的符号系统而言,符号意义的生成是在系统语境中依靠能指间的差异性来完成的。本文将两种语境论类型分别称为“关联性语境”和“差异性语境”。

尽管两种符号语境论对符号意义生成机制各具不同理解及界定方式,但都与整体论存在密切关系。据考证,“符号语境论”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1],而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一论断事实上是在“关联性语境”的意义上建构而成。他发现,原始部落中的大量语汇在不同具体社群语境中所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并由此提出:“对于某种话语(utterance)而言,只有将其置入其所在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才能理解其意义。”^[2]作为符号的各种语汇,是由原始部落成员在不同特定社群生产、生活条件下创制而成,因此与特定社会环境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在被置于这一话语符号产生时便早已形成的社群整体之中,其意义才能获得理解。另一方面,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差异性语境论同样体现出整体论特征。结构主义符号学强调,在横组合或纵聚合的诸多形式中,单个能指只有在结构整体内部通过其与其他能指的差异性的显现,才能获得稳定的所指意义。因此,无论是对于关联性语境论抑或差异性语境论而言,都以整体论为基本方法框架。

尽管两种语境论都强调整体语境中与能指相关的因素对能指获得意义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两者对意义生成机制的理解存在本质差异。关联性情境论强调,能指在与其相关事物间的联想性关系网络中获得意义,同时也暗示了如下逻辑,即文化语境的变化能够相应地带来符号意义的变化,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同样强调能指随语境之变化而产生相应变化的衍义机制,因此关联性语境论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符号意义生成机制极为相似。与之相应的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差异语境论则预设了固定的符号系统,并强调能指在语言系统的固定框架中遵循差异性原则获得单一所指意义,亦即其他能指对某个能指获得意义的可能性进行限定。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传统所惯有的共时性封闭特质,也使差异性语境论在被用于理解社会符号意义生成机制时,其阐释活力无法同与后结构主义原理相通的、具有明显开放性的关联性语境论相比。以克利福德·格尔茨为代表的美国“符号人类学派”,曾对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给予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便可被视为关联性语境论对差异性语境论之缺陷性的抨击。事实上,对两种语境论类型的运用以及这一运用过程所体现的效果差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同样曾有过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整体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便体现出浓郁的整体论倾向。美国学者第莫西·谢尔(Timothy Shiell)曾对作为“方法论维度整体论者”(Methodological Holist)的马克思的观念进行系统辨析:“从马克思的角度讲,整体大于它的诸多组成部分的总和,社会对象(例如劳工组织)要大于它互无联系的诸多组成部分的总和,而彼此关联的组成部分则是关键。”“整体对组成部分的属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仅从整体中的部分角度来进行考察,那么部分便不能(全部)获得认识。”^[3]中国学者赵福生认为:“马克思总是把他所考察的对象与人和其他对象联系起来”,并“将他所考察的对象放到与它关联的整体中来考察。”^[4]同时在对一系列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体论思想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尤其以“结构马克思主义”代表阿尔都塞为例,对马克思主义与索绪尔符号学传统在整体论方面的联系进行了详细论证^[4]。同时,日本学者今村仁司从“多元决定论”角度对阿尔都塞的整体论进行了剖析^[5]。此外,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将文学形式的整体性视为其美学属性的重要条件^[6]。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整体论思想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在很大程度上曾受黑格尔辩证法整体论思想影响,例如卢卡奇等人,但对于其中主张以科学方法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及其各自学派而言,其对整体论的理解显然有别于黑格尔思想,而源自其他哲学思想传统。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整体论的认识来源较为复杂。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整体论的运用,也集中体现于“社会群体与人”、“个别问题与整体问题架构”等性质截然不同的对象领域,尽管如此,其基本思路与整体论思想却始终一脉相承。

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符号语境论在整体论这一传统哲学维度上的共通之处,使得两种理论的契合成为可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包括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在内的诸多符号学流派的兴起,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将符号学运用至社会文化批评的实践意识。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所具备的整体论式认识途径,便成为其对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

符号语境论进行把握和运用的方法论基础。

三、德拉-沃尔佩与戈德曼：从差异性语境论到关联性语境论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伽尔瓦诺·德拉-沃尔佩敏锐地意识到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界中日益获得重视的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其继承者哥本哈根学派等符号学学派的价值，并将现代符号学融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仅仅通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维度来审视艺术品的单一化批评视角。将结构主义式的差异性语境论运用至对文学、雕塑及绘画等艺术形式的批评，成为德拉-沃尔佩符号学实践的重要内容。

德拉-沃尔佩明确提出要将包括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人在内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引入批评之中^{[7]12}，英国学者马尔赫恩曾对此总结道：“在早年的伽尔瓦诺·德拉-沃尔佩美学著作《趣味批判》(1960)对结构语言学所做的系统性借鉴下，意大利学界受其鼓舞，发展出不拘一格的以反黑格尔主义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8]同时，尽管德拉-沃尔佩从运用结构主义之初、尤其是在其晚年，便对包括列维-斯特劳斯理论在内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共时性倾向悖论性地表现出一定怀疑态度，但其符号学实践在事实上却体现出列维-斯特劳斯的“拼贴”(bricolage)观念。列维-斯特劳斯本以此术语来概括原始部落神话观念建构方式，在他看来，原住民将本无意义的材料组织成为整体系统的方式，以该系统所形成的整体神话框架来度量构成系统的个别组成部分的伦理意义。此后，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认识论延伸为审美方法，“在艺术品的情况中，审美创作以整合一系列一个或更多的客体、一宗或更多的事件为开端，展示出它们的共有结构”^[9]，审美客体的美学价值建基于由诸多个别组成部分所共同构成的意义整体，而对审美客体的整体观照，也是把握作品个别部分美学意义的基本方式。艺术品由诸多组成部分共同构成，其审美价值以整体性为逻辑前提，却又为诸多组成部分的审美判断提供了基本语境，这种略显悖论意味的观念，恰是德拉-沃尔佩艺术语境论的关键。

如前所述，为避免重陷传统马克思主义过度采取艺术批评单一维度的窘境，德拉-沃尔佩对文学、视觉静态艺术及音乐等不同美学形式分别进行剖析，并指明语境论在这些艺术门类的批评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首先，在文学领域中，德拉-沃尔佩将

语境视为文学文本中诸多组成单位意义生成的主要原因。以诗歌为例，诸多个别语词通过它与周围其他语词所共同形成的“有机语境”(organic-context)，使得这些作为个别组成部分的语词在整体语境中通过彼此间的差异而获得其应有的诗学意义。其次，在绘画、雕塑及建筑等静态视觉艺术中，作为各自艺术符号形式的线条、色彩及石料共同构建成一个其意义能够得到理解的艺术品整体，以此建立起一个理解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语境基础。再次，音乐艺术以诸多音响所构成的音程(interval)而形成音乐情感及观念，而音程为每个音乐符号赋予其情感因素，“一个音响唯有在被纳入音程的情况下方可转换为音乐音符(note)，方可构成音调与音阶(modes and scales)……并构成音乐语法的一部分”^{[7]217}。总之，艺术品都由各组成部分建立起整体语境后，依靠其在该语境中与其他部分的差异性而获得意义。由此可见，德拉-沃尔佩提出唯有将艺术品视为作为整体的符号体系，才能对构成这一体系的个别能指进行有效的审美经验和伦理解读，其“有机语境”概念显然属于从结构主义系统论出发的“差异性语境”范畴。

然而，德拉-沃尔佩的差异性语境论由此产生了一组悖论，即艺术符号的意义生成到底源于社会现实，还是产生自封闭的整体系统。德拉-沃尔佩虽然明确指出诗歌的差异性语境是诗歌语汇意义的生成机制，但同时却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承认所有文学意义都归根结底源于与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相应的意识形态，亦即源于历史现实，“当我们在研究中试图判定诗歌的意义或结构价值时……我们将同时判定这些作品被历史与社会从经验的角度所限定的途径”^{[7]24}，这便使德拉-沃尔佩陷入了应以共时性抑或历时性维度去看待符号意义的悖论，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应以形而上学的差异性语境、还是与历史现实相关的关联性语境审视符号意义生成性的悖论，这种悖论性地双重倾向也因此引发了诸多学者的争议^{[10]299}。德拉-沃尔佩的这种观点，尤其是其关于音乐审美价值的阐释，受到意大利学者阿曼达·圭杜奇(Armanda Guiducci)的批评，在他看来，德拉-沃尔佩的“音符—音程理论运用了一种非历史、含混而肤浅的方法”，并由此指明德拉-沃尔佩对结构主义的援引“一直是其研究方法的逻辑内核”^{[10]299}。恰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索绪尔所开创的共时性语境体系“将对语言的社会语境的遗弃作为其基本特质”，然而，“社会语境却是历时性规律

‘强制性’的渊源”^[11]。这样,索绪尔当年制造的难题在其实际上的追随者德拉—沃尔佩这里再次显现出来。

相对于德拉—沃尔佩对语境论的结构主义式理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锡安·戈德曼的语境论则直接受到帕斯卡尔整体论思想影响,且在事实上更接近于关联性语境论。戈德曼首先从文学文本角度探讨了语境论的体现方式,在他看来,“某些看似意义接近或一致的词汇、句子和短语,在不同语境中会获得不同涵义”^{[12]10},“语境会为相似的因素带来与其原初涵义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涵义”^{[12]11},亦即被置于不同文本语境中的语言单位会获得不同延伸含义,这显然是对关联性语境论的复述。其次,戈德曼援引皮亚杰发生心理学理论,主张作家所处阶级特有的“世界观”——亦即意识形态对其伦理、审美等层面的认识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整体系统的阶级意识形态便成为置身其中的作家个体诸多层面的价值观的基本结构,以及理解其价值观的基础。这样,理解一部作品的符号意义必须将其置于作家的个人生活脉络当中,从其思想发展的整体轨迹来观照作品的伦理向度;欲理解作家的思想状况,则必须根据其生活年代的所处阶级的意识形态属性角度来对之加以审视。

显然,相对于德拉—沃尔佩,戈德曼由此将对关联性语境论的理解和运用由文本延伸向了个人生活背景乃至社会领域中,使其符号语境论的分析对象显示出更加广阔的社会内涵。作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戈德曼尽管与德拉—沃尔佩一样受到过索绪尔结构主义传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在处理艺术符号时却并未采取与结构主义逻辑一致的差异性语境论,而是从关联性语境论出发,将对作为符号体系的文学文本和作者思想体系置于社会阶级的整体视域中审视,从而使其对符号意义的理解摆脱了结构主义式的形而上学,并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贯将其作为基本分析对象的历史社会范畴。

四、列斐伏尔的指称物式语境论

毋庸置疑的是,德拉—沃尔佩与戈德曼都是在整体论框架内运用符号语境论的,然而对于戈德曼而言,当研究对象指向社会范畴时,其“整体性”观念指涉范畴本身的抽象性使得这一观察视角呈现出某种阐释有效性层面的含混,并未触及到历史社会的具体性之上。事实上恰如学者俞吾金所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观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与社会现实间的关系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所关涉的“整体”,

实际属于与其日常生活及社会实践相关的“周围世界”(the environed world)^[13]。这样,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审视的符号体系而言,其意义来源恰是与生存实践相关的生产与生活领域。正是在这种理解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运用符号学的过程中,注重将对符号对象的语境落实到特定实践领域之内,而对指称物的运用因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学实践的重要途径。

有别于一般关联性语境论,符号的指称物在客观上同样发挥符号语境作用,从而形成为另一种语境论类型。所谓指称物,指符号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对象。尽管这一概念的来源相对较广,但符号学领域中的“指称物”概念,最早源于皮尔斯的“客体”(object),后经由奥格登、瑞恰兹及莫里斯等人发展,成为符号学界至为重要的概念。事实上,由于指称物为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组合)指明了具体的客体,将其意义固定于明确的指涉对象之上,指明符号的特定指涉意义,因此同样发挥了语境论的作用。

指称物概念也因此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开创了有别于德拉—沃尔佩与戈德曼整体论式语境论的其他符号语境论类型,其代表人物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列斐伏尔曾指出,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主义符号学运用至血亲组织形式分析时,将对组织形式——亦即能指与所指结合方式的可能性的剖析局限在数学模型式的推演之中,从而使血亲组织可能性脱离了社会历史背景,亦即具体历史语境,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显然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旨全然不符。列斐伏尔由此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被运用于社会文化批评时所体现出的方法缺陷进行强烈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指称物便以伴随文本形式发挥语境作用,对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亦即意义的生成起到了固定作用。例如,作为概念的“书籍”,意指一类纸质的文化用品;但该书版权页上的作为指称物的相关信息,便能够指明该书的出版社、字数、版次等诸多指称条件,才能将其指涉范畴限定和落实到具体社会对象之上。诚如列斐伏尔所言:“恰是语境赋予外延(denotation)以可以转达的具体性;外延功能包括语境性或指称性功能,它能够预设使所指的异位(isotopism)或同位(heterotopism)被具体化的指称:指称物决定所指是否能在同一时空内得到定位。”^[14]指称物与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性,使得符号的表意对象被限定在具体事物之上;换言之,符号在客观上获得了能够通过表明具体指涉对象的方式,

使符号与现实性、物质性存在发生关联,从而使符号的意义凝结在固定的事物之上。一般关联性语境论的核心观念,在于能指能够通过与其相关事物的联系性获得意义,而指称物语境论则强调能指自身所指明的具体对象为其提供理解语境。当指称物被运用于社会文化分析之中,其研究途径显然使得符号学实践更加指向社会现实本身,从而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历史社会现实为分析对象的一贯传统;同时,指称物指涉具体社会存在的基本特质,也使得列斐伏尔的符号学实践摆脱了抽象意义上的“整体”,从而维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涉的实践性“周围世界”范畴。

可见,列斐伏尔与戈德曼一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语境论的运用方式,由结构主义的差异性语境转向了关联性语境论,并由此使得考察视野由封闭系统转向了社会现实领域,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式复归其传统的社会历史视野;同时较

参考文献:

- [1]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1.
- [2]Malinowski,Bronislaw.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a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by C. K. Ogden and I. A. Richards[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23:310.
- [3]Shiell,Timothy. On Marx's Holism[J].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1987,4(2).
- [4]赵福生. 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J]. 学术交流,2008(1).
- [5]今村仁司. 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92—194.
- [6]张碧. 论詹姆斯的符号学思想[J]. 符号与传媒,2011(2).
- [7]Della Volpe,Galvano. Critique of Taste[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78.
- [8]Mulhern,Francis.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M].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 Francis,1992:13.
- [9]Lévi—Strauss,Claude. The Savage Mind[M]. Letchworth & Hertfordshire: The Garden City Press Limited,1962:26.
- [10]Fraser,John,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Galvano della Volpe[M].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7.
- [11]Hodge,Robert and Kress,Gunther. Social Semiotics[M].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32.
- [12]Goldmann,Lucien. The Hidden God[M]. 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Kegan Paul,1977.
- [13]俞吾金.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J]. 哲学研究,2013(8).
- [14]Lefebvre, Henri.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111.

之戈德曼,列斐伏尔的指称物式语境论将对语境的理解,由较为抽象的“阶级整体”引向了与符号直接相应的具体事物,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语境论的援引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致力“周围世界”领域相契合。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列斐伏尔对指称物式语境论的把握,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实践极富意义的改造与发展。

通过对德拉—沃尔佩、戈德曼、以及列斐伏尔各自符号语境论的分析,能够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符号语境论的理解和运用方式,不仅实现了由差异性语境论向关联性语境论的转变,同时也由结构主义对符号的封闭性理解、转向了对符号意义的开放性理解与阐释,这种方法及思路的转变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符号语境论实践落实到对历史社会现实的探究之上,也使符号学实现了对自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观照,从而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主义的主流立场与研究方法。